



东吴政治学论丛

丛书主编 谢岳

复合化治理

城市韧性的中国之治

The Synthesized Governance
Sources of Resilience for Chinese Cities

谢岳 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复合化治理

——城市韧性的中国之治

谢 岳 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合化治理：城市韧性的中国之治 / 谢岳等著.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21. 12
(东吴政治学论丛 / 谢岳主编)
ISBN 978-7-5672-3851-0

I. ①复… II. ①谢… III. ①城市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F29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76085 号

书 名：复合化治理
——城市韧性的中国之治
FUHEHUA ZHILI
——CHENGSHI RENXING DE ZHONGGUO ZHI ZHI

著 者：谢 岳 等

责任编辑：王 亮

装帧设计：刘 俊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215006

网 址：www.sudapress.com

邮 箱：sdcbs@suda.edu.cn

印 装：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邮购热线：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0512-67481020

网店地址：<https://szdxcbs.tmall.com/>(天猫旗舰店)

开 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18.5 字数：285 千

版 次：202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72-3851-0

定 价：72.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7481020



导 言 “复合化治理”：中国城市的韧性之谜

谢 岳 / 001

第一章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升城市韧性吗？

武永超 / 017

第二章 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

陈福平 李荣誉 / 038

第三章 “结对竞赛”

黄晓春 周黎安 / 064

第四章 空间结构如何塑造街邻关系？

贺霞旭 / 104

第五章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方亚琴 夏建中 / 129

第六章 从对抗到合作：城市微观秩序的构建路径

谢 岳 姚雨灵 / 157

第七章 认同性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活力

颜玉凡 叶南客 / 177

第八章 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的情感之维

曾 莉 周慧慧 龚 政 / 203

第九章 情境嵌入的治理理性

李慧凤 / 221

第十章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

张 晨 刘育宛 / 249

第十一章 城市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

谢 岳 葛 阳 / 269

谢 岳

现代化是一个近代现象，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过程。在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城市化是作为工业化的结果而出现的。尽管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这些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逆城市化的后现代过程，但是，城市仍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国际市场开始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就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东部沿海城市既是现代化的窗口，也是城市化的先行者。不过，由于战争、社会动荡等持续不断的冲击，不仅城市化的进程受到阻碍，整个现代化的事业也因此遇到重挫。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政策迅速地提高了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过去三十年里，城市化甚至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牵引力量。撇开城市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城市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化的水平决定了城市化的水平，城市化的水平反过来也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一个指标。

一、中国的城市革命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城市革命”。

表1显示,从2001年到2019年,城市规模的变化呈现人口更加集中的趋势,人口规模在4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在增加,而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的城市数量在减少。2019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6%,这个比例意味着,截止到2019年年底,60.6%的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而农村人口只有39.4%,城市化率远远地高于1949年的10.64%和1978年的17.92%。^[1]

表1 2001—2019年中国不同人口规模城市数量的变化

单位:个

年份	400万以上	200万~400万	100万~200万	50万~100万
2001年	8	17	141	279
2019年	20	44	98	8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2002年、2020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城市革命不仅仅表现在空间的变化和规模的扩张,事实上,还表现在社会结构、观念意识和行动模式更加深刻的变化。结构的、观念的和行动的深刻变革为城市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社会结构方面,城市人口的身份从过去单一的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新旧身份的变化首先是由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复杂分工带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传统工人身份经过短暂而剧烈的所有制转型逐渐地消失了。这些人流入新的职业群体当中,受雇于非公有制企业,或成为自主创业的雇主。在城市原住民身份裂变的同时,农业人口开始大量地迁移到城市,就业于城市多类企业,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成为灵活的城市就业者。虽然这些人口只有较少部分获得城市户籍,但是,他们在身份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和城市人口一同构成复杂而多样化的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多样化还表现在,由经济转型、职业分工和社会流动而催生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1952年,全国工会基层组织的数量只有20.7万个,工会会员数为1 002.3万人;2019年,这两个数量分别增加到了261.1万个和28 317.8万人。^[2] 1990年,全国登记

[1]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2020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2]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1999年、2020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注册的社团组织只有 10 836 个。^[1] 2020 年，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经攀升到了 89.4 万个，由社会团体（374 771 个）、基金会（8 432 个）和民办非企业单位（510 959 个）构成。^[2]

城市化同时塑造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国家对住房私人产权的承认与保护，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权利意识。围绕着产权问题上演的众多维权事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意识的强化。^[3] 在城市的阶层结构当中，中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们主要由职业人士构成，他们的收入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在于他们容易就公共问题形成集体意识。发生在城市里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及捍卫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都离不开这些群体的动员与参与。^[4] 不同于农村的环境维权和弱势群体的维权（他们主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城市人口围绕着环境等公共问题的讨论与行动，是基于世界观取向的集体意识^[5]，涉及权利保护的司法实践，也帮助城市人口确立更强的权利意识。进城务工人员受雇于非国有企业，规范雇佣关系的合同成为他们向司法机关申诉、保护劳动权利的凭证。在自身权利受到侵犯时，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不仅知晓相关的法律知识，而且清楚维权的司法路径。^[6]

城市化在改变人们的关系结构与观点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行动模式。在乡村社会，人们的集体行动常常是基于血缘关系，家庭和家族成为极具互助性的可靠组织。然而，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集体行动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9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h/200801/200801150094309.s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109/1631265147970.pdf>。

[3] Xie, Y. & Xie, S. R. Contentious versus compliant: Diversified patterns of Shanghai homeowners' collective mobiliz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9(115), pp. 81-98.

[4] Mertha, A. C. *China's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Tong, Y. Q.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5(1), pp. 167-188.

[6] Lee, C. K.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Ew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狭隘的、利己的、不可复制的。^[1] 只有超越了集体行动的狭隘基础，人们才能从事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城市无疑为这种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结构，使得人们凭借着非血缘和非地缘的关系，在更大的空间中产生关联性和彼此互动。建立在陌生的关系网络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集体性人际关系，为利他的社会信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一旦形成了社会信任，“陌生人”之间为了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才具备了行动的基础条件，即共同意识、互相承诺和彼此保护。^[2] 城市诞生了中产阶级，在权利问题和公共问题上，中产阶级成为先锋者，他们凭借着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信任，为具有风险的集体行动提供了保障。利他的集体行动，只有在城市中才可能发生。

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等现代社会科学大师都把城市以及由城市引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作为中心议题来研究，他们大量的经典作品都是回应当时城市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既然以城市为焦点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一个传统，发生在中国的城市革命当然有理由获得更多的学术关注。基于中国城市和城市化的独特性，以城市为焦点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精英与大众的互动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3] 在众多的研究议题中，城市韧性是一个例外主义的、具有重要政治价值的问题。

二、政治不稳定：城市化的代价

比较政治学在现代化问题上有一个经典共识，那就是，现代化过程一定伴随着政治不稳定；由大规模抗议、族群冲突、内战等构成的政治

[1] Tilly, C.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in modern Europe, in *Forging Nations: A Comparative View of Rural Ferment and Revolt*, ed. by Joseph Spielberg and Scott Whiteford.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9-40.

[2] Tilly, C. Cities, states, and trust networks; chapter 1 of *Cities and States in World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2010(3/4), pp. 265-280.

[3] Hurst, W. The city as the focus: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politics. *China Information*, 2006(3), pp. 457-479.

不稳定，也伴随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1] 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农村社会也常常是政治不稳定的温床，但是，城市的不稳定和城市化的关系更为直接。对于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因果联系，社会学科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城市偏向的政策

罗伯特·贝兹对中部非洲的长期研究，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的因果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非洲，贝兹发现了政府普遍采取“以牺牲农民利益来确保城市利益”的政策，强制干预农业市场。在农村，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低价出售给城市人口；在城市，政府向农业加工企业提供补贴，维持城市人口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2] 这就是著名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政策。“城市偏向”具有两个明显的目的：一是通过操纵市场、控制农业，将农民维持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从而降低他们挑战政权的能力；二是采取收编的办法，实行低物价、高补贴，在城市人口特别是特权阶层中建立政治支持。由于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掠夺性，长此以往，农民遭受的经济剥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造反。

城市偏向的政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制造了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成为诱发城市骚乱的根源：不平等导致了农村人口的经济机会急剧减少，为了生存，农民们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人口的涌入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密度；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又反过来增加了城市不稳定的风险。相对于农村，人口高密度的城市通常通过四个机制带来政治危险：① 城市人口更容易接近权力中心；② 人口聚集、信息流动更容易制造集体抗议；③ 大城市大多存在着居无定所的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相对于其他社区犯罪率更高，是制造骚乱的重要土壤；④ 城市容易形成诸如环

[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Bates, R. H.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境、人权等焦点议题。^[1]

（二）城市主义

城市主义是城市社会学定义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指的是城市人口之间建立起特定的关系或者特定的生活方式。^[2] 城市主义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秩序发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学者们和政府提倡城市主义的生活方式。城市主义意味着人际交往（和互动机制）的密度和多样化，能够形成强社会关系网络；人们的独立性增强，从而有利于创造力的发展。^[3] 中心城区的衰落、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由居住空间固化而带来的阶级再生产等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中引发了底层边缘化、阶级隔阂、种族冲突以及犯罪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不过，由城市带来的社会资本可以成为城市治理的积极资源。

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希望控制与遏制城市主义的发展。尽管城市主义能够培育出有利于城市问题治理的社会资本，但是，在国家精英看来，不论是观念形态、关系形态还是组织形态的城市主义，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被集体抗议所利用，制造政治不稳定。一旦社会资本演变为一种组织网络，集体行动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正是这些网络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抗议动员的重要资源。^[4] 社会运动的学者强调资源动员的重要性，反映了城市主义在社会秩序维持方面的另一副面孔。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爆发离不开人际关系的频繁互动，离不开城市人口拥有的闲暇时间，离不开公共价值观的发酵。^[5] 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发展会降低城市人口从事集体抗议的风险，同时，

[1] Wallace, J. Cities, redistributio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surviva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3 (3), pp. 632-645.

[2] Szelenyi, I. Cities under socialism-and after, in *Cities under Socialism*, ed. by Gregory Andrusz, Michael Harloe and Ivan Szelenyi.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p. 286-317.

[3] Simmel, 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0, pp. 48-51.

[4] Blokland T. & Rae, D. The end of urbanism: How the chang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cities affects its social capital potentials, in *Networked Urbanism: Social Capital in the City*, ed. by Talja Blokland and Mike Savage.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pp. 23-40.

[5] McCarthy, J. D. & Zald, M. Resources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6), pp. 1212-1241.

也会使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

（三）政治排斥

城市冲突的核心动力来自经济与社会分化，其中，阶级分化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尤其突出。^[1] 由于国家能够决定社会分化的程度与结果，政治对城市冲突的影响更加深远。政治排斥的解释具有悠久的历史。宽泛地讲，马克思对 1848 年欧洲城市革命的研究就已经开创了传统，因为工人革命和暴动正是起因于剥削他们的制度。政治排斥表明，国家运用政治力量，以制度的形式整体或部分剥夺某个群体的权利，同时保护其他群体的特权。政治排斥在不同人群之间划定了某些不平等的边界，定义各自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2] 美国早期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一个政治排斥的经典案例。这种排斥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权利的剥夺上，还体现在城市空间中某些清晰的界线上，例如，公共汽车上白人与黑人座位的隔离。南非在 1996 年之前的种族隔离制度也是政治排斥的极端案例。

政治排斥不仅影响到政治权利的行使，更有甚者，某些群体的社会权利被政治权力强制地剥夺了。在非洲的许多国家，政府削减教育经费，减少城市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对有色人种实施歧视性的就业政策，等等；^[3] 在拉丁美洲，对于聚集在贫民窟的来自农村的穷人，政府不仅不愿意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还采取粗暴的办法驱赶他们。^[4] 政治排斥是一种制度性的身份定义，一旦某种身份得以确认，不平等的关系也就随之固定下来。但是，由于政治排斥的目的是制造不平等，反抗总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那些遭遇不平等的人就有可能团结起来，改造或推翻不平等的制度。

[1] Marcuse, P. The forms of power and the forms of cities: building on Charles Tilly, in *Contention and Trust in Cities and States*, ed. by Michael Hanagan and Chris Tilly. New York: Springer, 2011, pp. 339-354.

[2] Tilly, C.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New York: Paradigm Publishers, 2006.

[3] Bratton, M. & van de Walle, 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2(4), pp. 419-442.

[4] Eckstein, S. *Introduction to Power and Popular Protest: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由政治排斥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一般会涉及范围广泛的政治变革，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发生政治转型。政治排斥诱发政治不稳定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这类过程大致都具备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人们对政府的不满首先来自经济方面，然后上升到政治诉求，要求政府进行改革；第二，政治排斥同时伤害到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从过去政府的支持者转而成为底层民众政治抗议的支持者^[1]；第三，政治排斥更容易吸引反对党的兴趣，他们会利用政府在政治上的不正义，在特定人群中间制造道德优势，然后再把这种优势转变为吸引民众、反对现政权的力量^[2]。

三、中国的城市韧性

比较政治学狭隘地定义“政治不稳定”，认为只有涉及人口多、范围广、暴力程度强的集体暴力事件，才意味着政治上的不稳定。为了便于将中国的城市政治纳入可比较的范围，我们用“城市韧性”代替“政治不稳定”，取其更加宽泛的含义。“城市韧性”在这里的含义不仅仅包含了“政治不稳定”的狭义内涵，而且包含着城市的犯罪率、城市人口对公共安全的满意度以及城市的经济繁荣程度。对城市韧性的评价，我们不仅仅采取横向的、静态的方法，而且采取纵向的、动态的方法。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韧性水平经历了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

在过去 40 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城市的集体暴力事件偶有发生，但是，这些事件波及的范围小，参与的人数少，暴力程度很低，参与者的诉求主要包括下岗再就业、养老金发放、环境保护、拆迁征地补偿等民事诉求。这些民事诉求和行动发生在中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并且在政府积极回应下得到积极解决。政府以制度化的形式回应这些民事诉求和行动，恰好构成了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改革的基本内容，解决了城市人口在经济社会改革中面临的种种困难，消除了更大规模的、

[1] Bratton, M. & van de Walle, 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2(4), pp. 419-442.

[2] Goldstone, J. A.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恶性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潜在威胁。因此，这种集体行动从纵向来看在逐渐减少，相应地，城市韧性在逐渐增强。

城市人口的犯罪特别是刑事犯罪是衡量城市韧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越密集，犯罪的可能性越高。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共1 613 629件，2019年，立案案件的数量上升到4 862 443件。^[1] 刑事犯罪事件的总体增长离不开城市人口数量的迅速扩张，离不开城市人口规模的绝对增大。不过，从刑事犯罪的类型去分析，我们发现，对公共安全冲击更大的恶性刑事犯罪行为，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年度占比在下降。表2显示的是从1997年开始，公安机关立案的恶性刑事犯罪立案数在当年刑事犯罪立案数中的占比每隔5年的变化情况。除了“伤害”行为在2007年的占比高于2002年，其他数据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表2 公安机关立案的恶性刑事犯罪立案数在当年刑事犯罪立案数中的占比（%）

犯罪类别	1997年	2002年	2007年	2012年	2017年
杀人	1.62	0.61	0.34	0.17	0.15
伤害	4.28	3.27	3.48	2.50	2.03
抢劫	8.77	8.18	6.09	2.75	0.72
强奸	2.52	0.88	0.66	0.52	0.5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1999年、2003年、2008年、2013年和2018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测量城市韧性的第二大指标是城市人口对城市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在其他国家，城市化通常伴随着高犯罪率，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社会治安的状况越差，公众的满意度越低。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根据公众满意度对2015年和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进行了排名。调查者发现，35个被调查的城市均获得50%以上的满意度，杭州获得最高评价（81.6%），获得80%以上满意度的城市共有2个；而且，城市越大、经济越发达的

[1]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1999年、2020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城市，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越高。^[1] 对比 2013 年的调查，我们发现，城市社会治安公众满意度在逐年提高：2013 年，只有排名第一的厦门满意度为 78.6%，而在 2015 年的调查中，4 个城市的满意度在 78.6% 以上。^[2]

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测量城市韧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指标。本书的最后一章“城市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展示了部分城市的土地财政收入情况。城市化给城市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是直接的、巨大的。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指标则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在 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逐年增长（图 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能力不仅逐年增长，并且增长的幅度较大。2000 年，人均消费金额仅为 6 808 元；2019 年，这个数字攀升到 35 625 元，增长至 5 倍以上。图 1 还显示，在居民年度平均收入方面，整体趋势也是逐年增长的：非民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从 2000 年的 9 333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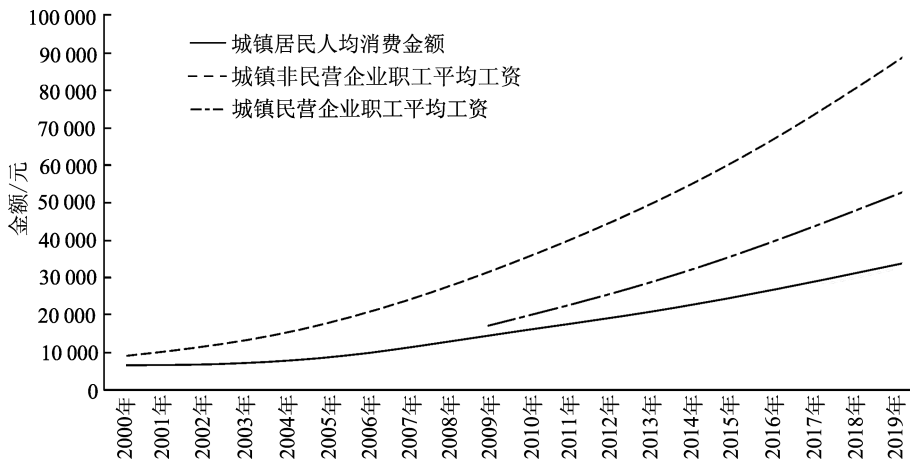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9 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消费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2020 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1] 钟杨：《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调查蓝皮书（2015—20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10—111 页。

[2] 胡伟、吴伟：《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调查蓝皮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86 页。

90 501 元，民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从 2009 年的 18 199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53 604 元。

四、复合化治理

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城市治理模式的探讨主要借用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诸如“多元治理”“整体性治理”“网格化治理”等。国内学者在借用这些概念和模式的时候，没有区分我国国情与西方国情的差异。西方学者在提倡这些概念和模式的时候，其出发点是对科层制进行去行政化改革，或者提倡以社会治理去克服行政治理的局限性。虽然这些改革倡议针对的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它们就受到了本土学者的批评。多元主义理论发现了社会组织和民间精英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家回归学派”则认为，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不仅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参差不齐，而且它们难以与国家之间形成力量均衡的格局。^[1]作为一种传统的组织，相对于社会组织，国家在治理方面无疑具有主导性力量。正是基于国家或政府在治理方面的主导地位，同时它们在治理方面又常常面临治理低效的情境，公共行政学者才提出了诸多公共管理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

当试图解释中国城市化的例外现象，也就是“城市韧性”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治理理论。我们提出“复合化治理”（synthesized governance）模式，以示区别于将各种治理主体视为力量均等化的“多元治理”模式。“复合化治理”模式类似于“多元治理”模式，存在着多个治理主体：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体。但是，不同于“多元治理”模式，在这些主体治理城市的过程中，主导城市治理的力量表现为自上而下、非均衡的关系。国家和政党的力量是绝对的；社会组织的作用是一种补充性的，在政府邀请之下，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合作；个体的参与则是依赖于组织的，有的是直接参与政府组建的组织，

[1]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

有的是参与社会的组织。既然治理的主导性是自上而下的，那么治理主体之间的依赖性则是自下而上的（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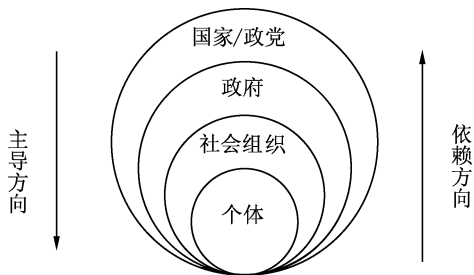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治理主体的关系结构与力量对比

本书集中探讨若干治理主体如何促进了城市韧性的加强，讨论的主体活动依次从个体到社会组织到政府再到国家。

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以技术治理为主题的研究，目的是求证新技术（新媒体和大数据）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城市韧性的加强。但是，从治理主体来看，城市韧性的产生与维持还是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在对“智慧城市”进行定义之后，研究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因为创新驱动产生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都会对城市韧性发挥作用。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典型的以行政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一章讨论的是由居民区居民自主建设的新媒体。研究发现，居民日常的新媒体资源网络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相反，由政府建设与维护的正式平台却收效不佳。正式平台之所以会导致技术功能的“收缩”，是因为层级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使官方平台的内容生产与居民社区性信息和互动需求分离。对比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发现，两种技术治理的实践都试图以技术赋能的方式产生积极的治理效果，但研究发现，由政府发起的大数据治理，效果是积极的，而由政府发起的媒体带来的治理效果却不及社区自发运作的新媒体带来的治理效果。两个案例表明，尽管都是技术赋能的试验，但是，同一个治理主体未必能够带来相似的结果。

黄晓春和周黎安的研究着重探讨作为治理主体的城市基层政府的治